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系列谈

从抗战烽火中汲取制胜智慧

——试析抗日战争中游击战基本样式及对现代战争的启示

■颜 慧

引言 习主席曾在多个重要场合提到抗日战争中游击战的重要性。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创造性地实践了“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游击战法，通过“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灵活战术，开辟广阔敌后战场，迫使日军陷入顾此失彼、两面作战的窘境，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种分散配置、灵活机动、袭扰消耗为主要特征的游击战，实现了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势能转换。当前，智能化战争形态加速形成，游击战思想的底层逻辑智慧非但没有过时，反而被赋予新的时代价值。

形式多样的“混合作战”

抗日战争时期，游击队并不是单纯地执行军事任务，而是融战斗队与工作队、生产队于一体的多功能混合体，进行的是形式多样的“混合作战”。毛泽东同志指出：“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游击队肩负多元使命任务，既要伏击歼敌、破坏交通，又要宣传组织群众、建立隐蔽政权，还要在根据地开展生产自救。聂荣臻同志要求晋察冀边区的游击队，既是抗击日寇的尖刀，又是减租减息政策的执行者，还是文化政治教育运动的组织者。这种军事斗争、政治工作、社会建设的高度混合与相互支撑，使得游击战拥有深厚的社会根基与持久韧性。

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中，混合作战的内涵与外延得到极大拓展，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外交、社会等领域融合叠加，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舆论、法律等手段综合运用，军事行动、网络攻击、信息舆论、认知操控、经济制裁等相互交织，界限更加模糊、力量更加多元、样式更加融合、调控更加灵活、目标更加隐蔽，具有复杂性、系统性、多维性等特性，作战行动的战与非战、敌与非敌更加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等，其底层逻辑是多重思维的全域混合博弈，以“组合拳”方式达成战争的政治和战略目的。这可以视为游击战“多元一体、综合制胜”思想在智能化时代的新发展。

因地制宜的“非对称作战”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遵循“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作战方针，以“非对称”之道扬长避短，进行的是因地制宜的“非对称作战”。八路军和新四军充分发挥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政治优势、地理优势等，在华北平原的青纱帐、水网密布的江南地区，因地制宜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等众多群众性游击战的作战方法，成功将日军困于“点线”之间，使其陷入“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日军哀叹：“见到八路军就头痛，他来了你不知道，你去打他，又打不到。”游击队的武器弹药主要“取之于敌”，“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就是生动写照。敌后武工队开展村村造地雷、户户有地雷的群众性爆破运动，发明创造出钢铁、石头、陶土、瓦罐等不同材料制成的伪装性好的地雷。这种不拘一格、因地制宜的战法，迫使拥有优势装备和实施正规战术的日军在复杂多变的游击环境中无处着力。

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中，非对称作战被赋予新内涵，强调以网络信息体系为基础，通过灵活运用力量、时间、空间和信息等要素，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形成非对称优势，并灵巧运用这种优势精确打击敌方复杂作战体系的脆弱节点，以能击不能，从而制胜于敌。这种非对称作战，更加强调智能化技术运用，追求的不是平台对平台的消耗，很重要的是以敏捷响应、低成本、可再生的智能手段，对敌之高价值、难再生的关键体系节点实施“四两拨千斤”的精确打击。这可以视为游击战“以我之长，击敌之短”思想在智能化时代的新跃迁。

形散神聚的“分布式作战”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军精良装备和严整阵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通过地理空间动态调整，达成“散得开、收得拢”的作战效果，进行的是形散神聚的“分布式作战”。毛泽东同志强调，按照情况灵活地分散兵力或集中兵力，是游击战争的主要的方法。特别是在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扫荡”由过去的逐步推进、压缩包围圈，再分区清剿变为“铁壁合围”“拉网式扫荡”，企图变“点”“线”的占领为“面”的战略。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方针，开展更加广泛的、群众性的、分散的游击战，以逐步消耗和削弱敌人。八路军在敌人展开合围时采取“化整为零”实现隐蔽机动，在敌人分兵进行“辗转抉剔”时采取“化零为整”形成局部兵力优势，有效挫败了日军的“扫荡”。正是这种战略耐性和组织韧性，使得游击战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持久战的重要支撑。

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中，分布式作战更加强调兵力部署广域分散、能力状态离散分布，根据实现作战企图、达成作战目的、遂行作战任务需要，优选最佳作战要素、单元、力量，通过作战能力融合、行动作用累积，聚合最优作战效应，激发最大作战潜能，实现作战效益最大化，达成最佳作战效果。这种分布式作战已经从“地理空间的分散”上升为“全域全维的动态耦合”。“形散”不再局限于人员装备在物理空间的分散，而是拓展到网络、电磁、认知等多维战场；“神聚”则依托数据链、人工智能和分布式指挥系统实现跨域协同，既极大提升了战场生存力，又倍增了打击效能。这可以视为游击战“化整为零、形散神聚”思想在智能化时代的新升华。

统分适度的“自主作战”

抗战时期游击战的指挥模式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进行的是统分适度的“自主作战”。毛泽东同志曾将游击战的指挥模式比喻为渔人打网，“要散得开，又要收得拢”。“渔人把网散开时，要看清水的深浅、流的速度和那里有无障碍”，“渔人为了收得拢，就要握住网的绳头”。百团大战就是战略集中、战役战斗分散作战的典型战例。1940年，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晋察冀军区、第120师、第129师等共105个团约27万人，在长达2800公里战线上相互协同、彼此策应，对日军发动了自抗战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略性进攻。作战期间各根据地的游击队根据战场态势自动参加战斗，自发追歼敌人。彭德怀同志讲，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具有高度自觉性和积极性的。

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中，自主作战是“人在回路的自主系统”与“任务式指挥”的深度融合，将自主作战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联合全域指挥控制系统的构想核心，就是建立强大、有韧性的信息网络，实现战略意图和关键信息的下达共享，从而将大量战术决策权下放至边缘节点，包括高度智能化的自主武器系统集群。这些系统依托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在上级赋予的任务边界和战略目标框架内，根据实时战场态势，自主进行目标分配、路径规划、战术协同和火力决策。这种战略意图牵引、智能集群自主的模式，将“OODA”循环“观察、判断、决策、行动”四个环节的执行时间压缩至秒级，既保持了战略统一性，又释放了战术灵活性。这可以视为游击战“战略统领、战术自主”思想在智能化时代的新呈现。

任务多元的“特种作战”

兵贵精不贵多。抗日战争时期游击战以“量少而质精”的编组，形成“比绵延的堡垒和堑壕还要机警和灵活的屏障”，进行的是任务多元的“特种作战”。长期艰苦卓绝的游击战锤炼出许多精悍善战的特种作战单元。彭雪枫同志组建的新四军骑兵团成为千里淮北平原上的一支能征善战的铁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按照中共中央确定的“敌进我进”方针，抽调部分骨干与地方军、民兵配合，普遍组织精干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对敌斗争。武装工作队一般由12~15人组成，以连排干部为主，再加上党、政、民多方人员混编而成。这种精干灵活的作战编成在严酷敌后环境中有着极强的机动性、隐蔽性和灵活性，犹如匕首般插入敌后战场，对打破日伪军“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起到重要作用。

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中，特种作战因其能够以战术行动达成战略目标，正成为军事力量运用的重要样式。特种作战已超越传统游击小队模式，深度融合人工智能、自主系统和高度专业化的职业军人。未来的特种作战单元，很可能由少数精英指战员、数据专家和战术专家组成，指挥控制具备高度自主能力的无人僚机、无人战车和智能传感器网络进行作战。这些无人系统在人工智能驱动下能自主完成渗透侦察、目标锁定、协同打击甚至电子干扰等复杂任务。这种特种作战模式，通过智能节点构成的“无形之网”实现智能无人主导下的特种精锐作战，以较低的人员风险，在广域空间能同时执行多重高危任务。这可以视为游击战“以小博大、以精制胜”思想在智能化时代的新样态。

群策集

『具象化』研究作战问题

■高 凯 卢晨昊

作战问题研究是着眼现实对手、自身能力以及未来可能作战地域，展开作战指导、作战方法、作战编成、作战部署等相关作战关键问题的研究。这就要求有具体化的解决方案、可落地的措施办法，切实进行“具象化”研究。

以目标引领规划设计。有的才能放矢，研究作战问题更应如此，要想研究的作战问题有时代价值、有现实意义、有可操作性，就必须有明确的对手立好靶子，搞清楚与谁打、在哪里打、怎么打这些具体问题，更易于实现“具象化”。要紧盯现实对手和潜在对手，围绕敌之战略、装备发展趋向、兵力部署调整等思考敌之“棋局”的变化，前瞻规划、提前布局，分析对比敌我双方力量强弱点、部署的优劣点、环境的利弊点，区分战略、战役、战术三个层级，围绕火力打击、兵力突击、信息攻击、空天防御、特种作战等具体行动，逐级分解任务、明确作战目标，将诸军兵种研究的问题与现实对手结合起来、与相关地域结合起来，为“具象化”提供解题思路。

以理论牵引勾勒线条。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作战理论作为军事实践总结基础上的理性升华，具有前瞻性、科学性，能够以正确的作战理论作支撑就稳固住了研究作战问题的基本方向。人以什么方式生产就以什么方式作战，先进的作战理论顺应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是在对现代及未来作战形态的正确认识基础上形成的，有助于在作战概念、行动设计、力量构成、作战编组、武器装备研发、战术打法等问题上形成科学认识，进而给予正确的方法指导，形成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的逻辑自洽，为“具象化”提供正确方向。

以数理支撑搭建架构。作战既是艺术也是技术，更是一门融复杂性、系统性、交叉性于一体的科学，需要运用数理方法予以支撑，才能确保其严谨性、科学性、合理性，这一内在要求需要我们在研究作战问题时形成以定量手段为主的研究习惯，用数据讲话、用模型推演，尤其是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军事领域的深化运用，为我们搭建数理模型研究作战问题提供了便捷。在研究决策性问题时，可采取德尔菲法、决策矩阵等手段，进行多轮次重要决策问题分析，并结合兵棋分析得出科学决策结论；在研究具体行动时，可采取战斗力指数方程、贝叶斯方程等，运用模拟系统进行解算，找出行动的“最优解”；在研究保障资源投向时，可运用大数据预测、大模型分析等手段，自主研析保障资源需求，为“具象化”提供科学架构。

以经典战例提供借鉴。战胜不复，昨日的战争经验不能生搬硬套在今日的战争实践上，但前人在作战实践中对作战原则、规律的探索却能够为我们研究作战问题提供基本遵循，这需要我们加强史鉴研究，不人云亦云，从史料与史论的背后找出制胜战场的“密钥”。要变传统的经验思辨思维为系统分析思维，从统一立场出发，运用统一观点、统一方法，结合史鉴研究解释已经发生的作战现象及预测尚未发生的作战现象，真正找寻作战的本质规律；变传统的模糊描述为精密描述，在计算、模拟的基础上，运用数理模型以及数学语言描述作战现象，抓住作战的内在规律，进而把握现实情况，利于更加准确、深入地分析研究，为“具象化”提供鲜活内容。

以训练检验完善提升。军事训练是战、建、备等各项作战问题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作战能力的关键环节，也是检验作战理论成果是否符合作战所需的必由之路，是对作战问题研究成果螺旋式丰富完善的过程，实现“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完美对接。要注重检验作战指挥研究问题成果，结合指挥作业、实兵演习等时机，对指挥所编成、人员编组、指挥手段等进行全要素、全系统检验，检验成果可行性、数据真实性；注重检验联合作战研究成果，围绕联战体系构建、指挥机构运转、兵力火力协同配合、综合保障支撑等方面，检验联合体系运转的堵点、卡点并查找重难点问题，消解矛盾困难，为“具象化”提供落地支撑。

“牛刀杀鸡”当用则用

■刘子超

挑灯看剑

“杀鸡焉用牛刀”出自《论语·阳货》，比喻办小事情，何必花费大力气，也就是不要小题大做，因为这样的做法会增加成本、降低效益，得不偿失。然而，现代战争中，如果一些制约战斗力生成的短板弱项不抓紧在“枪响之前”补齐，战场上就会付出血的代价。所以，“牛刀杀鸡”就是要重视问题，善于集中各种优势资源努力做好所需之事。练兵备战越是步入“深水区”，暴露出的问题短板就会越多，但解决问题、补齐短板的过程，原本就是化危为机、强能赋能的过程。这时就不妨拿起“牛刀”来“杀鸡”，舍得采取高维度、高效率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达到直击要害、势如破竹的效果。

强化“牛刀杀鸡”的问题意识。短板弱项是己方战斗力链条的薄弱点，甚至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金无足赤”，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军事训练，以“牛刀杀鸡”的态度对待训练短板，多拿“显微镜”看问题，有意识地利用图上推演、复盘反思、研讨交流等总结得失、寻找差距，要见微知著、深挖根源，真正把缺点找全、短板找准、问题找细。要善于“解剖麻雀”，针对作战数据背后折射出的问题，多一些较真意识和认真精神，防止查改问题大而化之、隔靴搔痒。

保持“牛刀杀鸡”的决心韧劲。备战打仗工作中，有些问题是难啃的“硬骨头”，须真动刀动真刀。然而，“补短”最忌半途而废，要像“攻山头”一样，紧紧扭住“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这个关键，从每个课目严起、从薄弱环节抓起，从实战需要、岗位需求出发，紧盯能力不足的“痛点”开展实装、实景、实案化强训补差，让训练水平在真打实抗中接受全面检验。要直面“补短”过程中的矛盾困难，以大刀阔斧的魄力勇猛精进，哪怕是训练难度大、风险系数高的“烫手山芋”，也要下大决心、花大力气迎难而上，努力补齐短板，消除弱点。

用好“牛刀杀鸡”的实践方法。“牛刀杀鸡”的目的，在于集中优势资源攻其一点、精准发力，通过解决关键性问题带动整体工作进展，促使问题得到迅速而有效地解决。解决短板问题不能搬“胡椒面”、搞“一锅煮”，要充分发挥作战需求对新质战斗力体系能力达成的牵引作用，明确关键指标、规划建设路径，在综合考虑效费比的基础上，加强体系设计、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共同合力。要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优先把那些备战急需、打仗急用、部队急盼的问题摆在突出位置，有计划、有针对性地攻克难点、破解重点，从最容易失利、最容易被对手拿捏的“硬伤”入手，把关键步骤训实、将新增课目练够，打通作战能力生成关键节点，真正确保以最快速度响应未来日益复杂的战场需求。

把握好智能决策的“度”

■陈志华 李 琦

谈兵论道

凡事皆有度，无处不讲度。指挥活动之度，最难以把握，也最需要把握。当前，智能化战争形态加速演进，智能成为指挥决策提质增效的关键“催化剂”。指挥决策的时效性，要求指挥员在有限时间内做出相对最优决策，而非绝对最优决策，以谋求先敌决策优势，赢得战争主动。因此，并不是数据越全越好，算法越优越好，算力越强越好。要把握好智能决策的“度”，处理好全量数据与关键数据、最优算法与次优算法、决策需求与算力能力三种关系。

处理好全量数据与关键数据的关系。数据是智能决策的基础。大规模、多样化的全量数据能够涵盖战场全域信息，具有广度优势，决定了算法能够获得的知识范围和泛化能力，是深度态势感知的基础，是智能决策的前端支撑。然而，数据并非越多越好。数据越多，数据获取、分析、处理的难度越大，耗时越长，智能决策的时效性越难以保证。即使决策再优，也可能因错失先机变得毫无意义。关键数据是指挥决策的核心依据，具有高价值密度和强针对性，能够快速聚焦战场核心矛盾，但也存在难识别、难挖掘的困难，一旦关键数据确定错误，则容易陷入片面性误区。盲目追求全量数据，会陷入“数据沼泽”，导致决策滞后，贻误战机；而过度依赖关键数据可能因信息片面导致决策错误。处理好全量数据与关键数据的关系，就要正确认识其各自的优缺点，辩证予以把握和运用。要基于指挥决策需求，利用知识图谱、关联分析等技术，动态筛选、准确识别关键数据，特别是对于实时性要求高的关键数据，应优先处理，以确保决策的及时性。与此同时，科学运用全量数据，挖掘潜在的决策风险点，以验证关键数据的准确性，提高决策质量。

处理好最优算法与次优算法的关系。算法是智能决策的核心。最优算法追求理论上的决策最优解，如深度学习中的强化学习算法，可通过大量数据训练生成复杂战场环境下的最优决策方案，但计算复杂度高、训练周期长，对算力要求极高。而次优算法则以牺牲部分精度换取效率，如启发式算法、遗传算法，能够在短时间内输出可行解，适用于实时决策、快速决策场景。不同的算法适用于不同的任务场景。在开展决策活动时，如一味追求最优算法，则可能因计算耗时过长导致决策滞后；而单纯强调次优算法快的优势，则可能因精度不足造成决策适用性下降，招致行动失败。处理好最优算法与次优算法的关系，关键在于动态适配算法，注重算法协同。要根据决策层级、时效性和精准度等需求动态适配算法。如，战略战役级的作战计划拟制可采用最优算法，而战术级的火力规划则优先使用次优算法。为了提高智能决策算法适配效率，可探索构建“次优算法—最优算法”两级决策模型。先运用次优算法生成初步方案，快速缩小决策空间；再基于初步方案，调用最优算法细化完善，实现效率与精度的平衡。

处理好决策需求与算力能力的关系。算力是智能决策的基础。再优的算法、再好的数据，没有足够的算力支撑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决策需求无限，而算力资源有限。若算力配置不足，将导致算法模型无法运行或结果失真；若过度投入算力，则会产生资源浪费，造成其他决策的算力真空。此外，智能决策活动对算力的需求具有多样性与动态性。态势感知、方案拟制、任务规划、推演验证等各决策环节具有多样化的决策需求；不同阶段、不同时节、针对不同对象的决策活动，对算力的需求也是动态变化的。处理好决策需求与算力能力的关系，就是要强化“量需用力”的意识，合理分配算力，灵活调用算力。应确立以需求为导向的算力分配机制，运用智能决策算力需求评估模型，结合决策复杂度和时效性要求，采取定量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科学测度算力需求。在此基础上，采取“云计算中心集中处理复杂决策+边缘节点快速响应战术决策+终端设备支持单兵决策”三级算力协同模式，实现算力资源的合理分配与高效利用。在保障算力的过程中，还应根据战场态势和决策需求的动态变化，运用算力资源管理云平台，灵活调用闲置算力，提升算力资源的整体运用效能。

编后 度者，事物的本质界限和平衡节点也。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都是矛盾运动并随之发展变化的。在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度的界限、度的节点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一旦超出这些界限和节点，事物就可能发生质的改变。战争领域充满着辩证法，度的问题无处不在，战争制胜机理也饱含着辩证制胜原理。如何适度作战、以度制胜，这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永恒课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深入实践和不断发展。把握智能决策的度，关键还是要处理好人力决策和智能赋能的关系，充分发挥好人的主观能动性。要牢牢扭住人这一指挥决策核心，准确把握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特点规律，深刻认识智能赋能指挥决策的内在机理与方法路径，既要敢于运用智能支撑指挥决策，又要合理明确人智职能分工，既要强化智能赋能，又要避免智能依赖，以智赋能、人智融合，智胜未来战争。